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天問研究

孫作雲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天問研究

孫作雲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天問研究 / 孫作雲著. — 開封: 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8. 4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ISBN 978-7-81091-780-3

I. 天… II. 孫… III. 天問—研究 IV. 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21442 號

責任編輯 靳宇峰

封面題簽 王劉純

助理責編 王亞濤

封底篆刻 劉廣祥

封面設計 鳳文傳媒

出版發行 河南大學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開封市明倫街 85 號 郵編: 475001

電話: 0378-2825001(營銷部) 網址: 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務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張 12.25

字 數 286 千字

印 數 1—1500 冊

定 價 30.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河南大學出版社營銷部聯係調換)

出版說明

河南大學是一所有近百年歷史的老校。自建校以來，一向重視國學研究，并形成了一支實力雄厚、傳承有序的研究隊伍，在國學研究領域可謂人才濟濟，成果豐碩。經初步調查梳理，近百年來在河大工作過的有高深國學造詣的學者包括大師級學者有數十人，出版有關著作近百種。為弘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國學研究的進一步繁榮發展，我們從中遴選在學術史上有一定地位、至今仍有研究參考價值的作品分批整理出版，這便是“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的由來。現對本叢書編纂出版的有關問題說明如下：

一、建校以來在河南大學（包括其前身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中州大學、河南中山大學以及后來的河南師範學院、開封師範學院、河南師範大學）曾經任教或求學的校友，都在叢書作者的人選範圍。

二、一生大部分時間服務於河南大學，以及離、退休或終老於河南大學的作者，其所有國學著作均在叢書入選範圍；曾經在河南大學求學或任教，後來離開河南大學的作者，入選作品則以在校時寫作或出版者為限。

三、叢書所收作品，以曾經正式公開出版者為主。少數確有較高學術價值而由於種種原因未曾正式公開出版過的作品，則據稿本或可靠的印本收入。

四、叢書所收作品都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代表的是當時的學術水平，難免帶有當時的種種局限。這次整理出版，在內容上悉以底本為準，不依據后來的研究成果進行校訂。

五、叢書統一用繁體字排印。在編校過程中，對原底本中的異體、俗體、簡體字做了規範化處理，錯、漏、衍、倒等技術性差錯做了糾正。根據古籍整理慣例，對傳統典籍中約定俗成的通假字、古字和特殊人名、地名等用字不加改動。

六、由於河南大學在近百年間屢經分合，數易其名，加之抗戰時期輾轉遷播，人員進出頻繁，為叢書作者作品的遴選增添了不少難度。此外，“舊著新刊”作為一種特殊的出版形式，有許多問題還在探索之中。因此，叢書第一批的出版，無論書目的選定還是具體的技術性處理，都一定存在不少缺憾。誠望廣大讀者特別是河南大學知情校友和有關專家不吝賜教，以便使以后陸續推出的叢書逐步臻於完善。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編纂出版委員會

2008年3月

序

史 樹 青

吾友孫君心一哀集其父雨庵先生遺著《〈楚辭〉研究》、《〈詩經〉研究》、《神話傳說》、《民俗與美術考古》共四卷，匯為《孫作雲文集》，將付剞劂，以余與雨庵交誼甚篤，且一度同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從事研究工作，舊學商量，新知學習，知之較深，囑為撰序。

余謂雨庵先生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東北大學任教，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逝前任河南大學歷史系教授，為我國學術界卓有成就的學者。數十年來致力於我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研究，在歷史、考古、文學及神話傳說各個領域，都有重大的建樹，對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一定影響。蓋其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深受聞一多先生熏陶，掌握了聞先生的治學方法，尤其對聞先生的楚辭學心悅誠服，所以雨庵對楚文化的研究既是多年從事的專門課題，也是他所獲成就最大的一個領域。在雨庵先生勤奮的一生中，為我們留下了二百餘篇（部）學術論文（著），其中有關《楚辭》的論文（著）約佔四分之一，如早年所著《〈九歌〉山鬼考》、《〈九歌〉司命神考》、《〈九歌〉非民歌說》、《〈九歌〉東君考》、《〈九歌〉湘神考》、《〈離騷〉

正文的推測——〈離騷〉文意與文貌之復原》等，數量是很多的。他晚年完成的《〈天問〉研究》只是《楚辭》研究的一部分。

1975年2月，雨庵在給我們的信中說：“因注《天問》，專心致志，苦思冥想，思與屈原神會。”又說：“先整理錯簡，連帶校正錯字，其次再加以注釋（注音、釋字，說明錯簡原因），再次是翻譯（譯意），再次是前言，最後是考古插圖，書名是《〈天問〉新解》或《〈天問〉研究》，完全是我孤軍奮戰，苦得很，每解決一個問題，也有‘誤書思適’之樂。我很想把屈原所見楚宗廟壁畫，恢復一部分（不可能全恢復，亦無此必要），大約可以找到三十張圖，使考古材料與《天問》相印證。”

雨庵先生從事《詩經》的研究，是與楚文化研究有很深的聯繫的。他以《詩經》為基礎，得出了西周是封建社會的結論，認為這個問題不明，其他上古史的許多問題皆無從着手，所以使周代社會的研究擴大了領域，為我國學術界所關心的古代史分期問題樹立了一家之言。所著《〈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收入了大部分論文，對《詩經》文字的解釋和編排，結合周史，提出了許多與人不同的見解，我認為都是新義。昔孔子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今雨庵先生《詩經研究》一出，真可以說是“雅頌各得其所”了。惜十五國風無楚風，遂把《楚辭》視為楚風，將書齋取名“楚風堂”，以示自己畢生研究《楚辭》和《詩經》的志向。

1976年，雨庵先生制定了新的規模龐大的研究規劃，準備在修訂舊作的基礎上，不只是研究楚文化，而是與教學相結合，對我國古代社會進行深入的系統研究，他曾給我寫信談到這項規劃的簡單內容：

一、寫《屈原傳》，對於屈原本本人及作品（寫作背景及年代）雖已有初稿，還要補充提高。努力方向在研究戰國史地及戰國考古發現情況。

二、寫《屈原的抒情詩》及《屈原的祭神歌》二書，已有論文十幾篇，再重新整理，並注釋文字，在《屈原傳》的基礎上重新評價其作品。

三、寫《古器物圖像與神話傳說的關係》（或名《器物圖像與神話傳說研究》），已有《蚩尤考》、《饕餮考》、《羽人考》、《飛廉考》、《敦煌畫中的神怪畫》、《評〈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馬王堆出土帛畫》、《密縣打虎亭東漢畫像石墓墓門畫像》、《長沙戰國帛畫》（二種）、《龜蛇畫像》、《天問圖》等。以此為契機，重新研究從原始氏族到國家這一段歷史。1978～1980年寫出一本《論夏代文化》小冊子，先看《戰國策》，以後再看先秦諸子，每看一次，都會有新的收穫。但時間總是不够用，加之讀書太少，知道的東西太少，悔不當初，玩忽歲月，太不用功。中國的舊學問懂得的人越來越少，如何以馬列主義之矢，射中國文化之的？偶爾查查標點本史書，覺得有許多不對，由此可見，研究學問非下苦功夫不可。

這是雨庵先生晚年的學術研究規劃和治學的深刻體會，語重心長，出於肺腑，雖然他的規劃未盡完成，但經心一遵照規劃進行整理，除《〈楚辭〉研究》、《〈詩經〉研究》以外，還有《神話傳說》、《民俗與美術考古》各一卷，基本合於規劃的原意。至於他的治學經驗，經常現身說法，勉勵後學，不但對校內的同學講，還對向他請教的同志、朋友講，教書育人，傳道、授業、解

惑，態度虛心誠懇，受到了各方面的普遍贊揚。

從雨庵先生的一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把楚文化研究當做畢生的事業，始終不懈地努力探索，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後時刻。在研究的許多重要問題上，他緊緊追步於聞一多先生之後，既繼承了前人的已有成果，又時時在開辟新的途徑，不斷地把學術研究推進到更高的水平。就這一點來說，雨庵先生在我國研究古代史的學者中，不失為承前啓後的一位。

西周重器青銅天亡簋（大豐簋）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從來都認為是西周建立後第一件鑄有西周歷史的青銅器，經雨庵先生研究，銘文中有“不（丕）克氣（訖）衣（殷）王祀”句，遂定為武王滅商以前的銅器，並論“天亡”即武王的太史“史佚”，這種論點是可信的，因此否定了一些人對滅商以前周人無銅器的說法，進一步證明了周人滅商以前的文化成就，由此可以看出雨庵先生結合實物研究古史的貢獻。

雨庵先生關於我國古代的神話傳說和民俗美術的研究，也探跡索引，窮本溯源，從圖騰信仰到民間習俗，遵照科學態度，提出了許多重要的見解。

總觀雨庵先生這部著作，對我國古代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神話傳說、文物考古等大有“鑿破渾沌”之功，於後學研究工作的啓迪和教育既深且遠，其書是可以藏之名山，傳之後人的。

余因應心一之請，勉撰短序，重讀雨庵諸作，愈覺其學術研究的博大精深，三復斯言，以當弁首。

一九九八年九月一日史樹青謹序

殫精竭慮 求索楚風

——孫作雲先生傳略

孫 心 一

孫作雲先生(1912~1978),字雨庵,號龍舉,漢族,遼寧省復縣(今瓦房店市)人。河南大學歷史系教授。1912年正月初六(公歷2月23日)出生在一個已經富裕起來的家庭。父親上過私塾,念過《四書》、《五經》,略懂中醫之道。母親葛氏,是位賢妻良母。1919年2月(7歲)就讀本村小學。先生自幼聰慧,深得教師格外的青睞。1924年12月(12歲)小學畢業後,考入復州城內復縣初級中學,1928年(16歲)考入沈陽東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從師於梁啟雄先生(梁啟超之弟)。梁先生的淵博知識和嚴謹治學態度,對先生影響甚深。由於發憤讀書,刻苦勤奮,考試成績名列前茅。先生立志做一個對國家、對民族有用之人,因此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文學作品和理論方面的著作,希望將來做一位詩人。當時,先生曾擔任附中校刊編輯。1931年7月(19歲),他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東北大學附中,學校特準免試升入東北大學,然而先生却孑然一身來到上海,考入了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後因戰局急劇變化,先生返回老家。1932年4月與徐桂芳女士訂婚。是年金秋,考入北京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跟隨聞一多先生學“國文”,選修《楚

辭》，教室在“清華學堂”舊大樓 105 號。在聞先生的鼓勵和幫助下，第一篇學術論文《〈九歌·山鬼〉考》刊載在 1936 年《清華學報》上。在清華大學時曾擔任《清華周刊》雜誌的編委。1935 年發表《論現代派詩》及許多新詩作品。

1936 年（24 歲）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同年秋天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導師仍是聞一多先生。這一時期，先生主要致力於《九歌》研究，發表的論文有《〈九歌〉司命神考》、《〈九歌〉湘神考》（此文為大學畢業論文）、《〈九歌〉非民歌說》，譯有青木正兒《楚辭〈九歌〉之舞曲的結構》。先生的學術研究是從《九歌》發軔的。古代的祭祀典禮與祭祀者的階級地位相適應，《九歌》中的天神、地祇不是普通百姓所能祭祀的，於是先生提出《九歌》是楚國國家祀典的樂章，“這種學說成為《九歌》研究中影響很大的流派”（周勛初：《〈九歌〉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 頁），先生沿着聞氏的治學途徑，把《九歌》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

1937 年盧溝橋事變，戰爭的陰雲籠罩清華校園，9 月底，先生重返故裏。1938 年 7 月又返回北京，在“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任編輯，從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工作，歷時三年有半，編成《經部·詩經類目錄》、《史部·金石類目錄》各一本，助編《子部·藝術類目錄》一本，補定《史部·地理類·方志之屬》東北縣志數篇及《子部·藝術類·食譜之屬及遊戲之屬》提要十餘篇。

1941 年秋，先生受聘於北京大學文學院，任講師、副教授，講授中國古代神話研究、民俗學、《楚辭》、中國古代史課程。此時，除撰寫《〈九歌〉東君考》（1941 年）外，全部精力集中於史前史的研究，1941 年前後主要著述有《釋姬——周先祖以熊

爲圖騰考》(1939年,1957年重寫時改名《周先祖以熊爲圖騰考》)、《蚩尤考——中國古代蛇氏族研究》(1940年)、《泰山之禮俗研究》(1941年,北京大學鉛印本講義)、《槃瓠考》(1942年)、《飛廉考——中國古代鳳氏族研究》(1943年)、《后羿傳說叢考——夏初蛇、鳥、猪、鯢四族之鬥爭》(1944年)、《鳥官考——中國古代鳥氏族諸酋長考補》(1946年)。“七考”多發前人所未發,用圖騰崇拜去探索中國古代神話傳說的底蘊,論證了蚩尤以蛇爲圖騰、商人以燕子(玄鳥)爲圖騰、周人以熊爲圖騰,指出我國古代史的“三代”是由三個氏族發展擴充而來的,對我國民族社會的圖騰制度進行了開拓性研究,許多朋友戲謔地稱先生謂“孫圖騰”。先生從《九歌》研究漫延到神話傳說、民俗的研究,不能不歸功於學生時代對《九歌》的探究。《九歌》是一組抒情詩,它所描寫的許多神祇,既具有神話的研究價值,又與古代的祭祀典禮相關聯,也具有民俗學的研究價值。因此,《九歌》的研究促進先生旁及神話傳說和民俗學的開拓。此間,先生還在北京師範大學兼課,在中國留日同學會出版的雜誌任編輯,還曾在中學兼教國文課,聊補生活的困窘。

1946年至1949年,先生應聘在東北臨時大學補習班、東北大學、長白師範學院任中國文學系副教授,講授中國古代神話研究、《楚辭》、《詩經》、中國新文學研究等課程,同時擔任沈陽博物院研究員,主編《歷史與考古》、《國立沈陽博物院匯刊》,編輯出版《遼海引年集》(紀念金毓黻先生60壽辰的論文集),1948年隨博物院到北平,任中國大學教授。

1946年至1948年間,先生繼續從事神話傳說、民俗和《楚辭》的研究工作,著有《說丹朱——中國古代鶴氏族研究》、《說高蹠戲出於圖騰跳舞》(1946年)、《說羽人——羽人圖、羽人

神話、飛仙思想之圖騰主義的考察》(1947年),並在《東北民報》(沈陽)上連載《年前年後——從民俗學上考察年節》、《三月三起源》(1947年)、《〈離騷〉正文的推測——〈離騷〉文義與文貌之復原》(1948年)等。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先生即入華北大學政治研究所學習。1950年3月調進北京歷史博物館(今中國歷史博物館前身)工作,任設計員,承擔中國通史展覽的設計工作,提出在原始社會的陳列中應將我國古代的神話傳說與圖騰信仰作為輔助材料的設想。本年加入中國史學會,與張政烺、李光壁教授等發起創辦《歷史教學》雜誌,任編委,1951年正式出版發行,這是我國建國後最早的史學刊物之一。1952年應聘於新鄉市的平原師範學院(今河南師範大學)任教授,講授中國古代史、中國文學史課程。1956年院系調整後,執教於開封師院(今河南大學)歷史系,講授中國古代史、中國文學史、歷史文選、《詩經》選讀等課程。先生淵博的知識,透徹的講解,深受學生熱愛,外系的學生常常擠進先生的講堂聽課。先生還擔任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史學月刊》編委、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第四屆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務。

解放後,除了擔任繁重的教學任務之外,先生的學術研究進入了新境界,發表了許多有見地的論文,如《從上官大夫奪稿說到屈原因〈離騷〉而得禍》(1952年)、《屈原在楚懷王時被放逐的年代》(1953年)、《在歷史教學中怎樣處置屈原問題》(1954年)、《〈九歌〉的寫作年代》(1956年)、《〈大招〉的作者及其寫作年代》(1957年)、《讀〈史記·屈原列傳〉》(1959年)、《屈原的放逐問題》(1961年)、《楚辭〈九歌〉之結構及其祀神時神、巫之配置方式》(1961年)、《〈離騷〉的主要錯簡》

(1962年)、《從〈離騷〉的寫作年代說到〈惜頌〉、〈抽思〉及宋玉〈九辯〉的相互關係》(1962年)、《漢代司命神像的發現》(1963年)、《〈九歌〉與民歌的關係》(1963年)、《從〈天問〉看夏初建國史》(1978年)、《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編年》(1979年)、《論楚辭〈天問〉對於我國上古史研究的貢獻》(1979年)、《說〈九歌·東皇太一〉爲迎神曲》(1980年)、《屈原和河南》(1982年)、《秦〈詛楚文〉釋要》(1982年)、《楚辭〈天問〉與楚宗廟壁畫》(1983年)等二十餘篇。四十多年來,楚文化始終是先生研究的主要課題,用力最勤,占全部論文約三分之一,是獲得成就最大的一個領域,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爲了自勵,先生的書齋取名“楚風堂”,以示自己以《楚辭》和《詩經》爲畢生研究的志向。

1966年“文化大革命”伊始,先生被誣爲“反動學術權威”,在險惡的條件下,仍孜孜不倦地拼力求索,毫不氣餒。1974年盛夏,先生不顧溽暑之苦,着筆於四十年前就立意撰寫的《〈天問〉研究》(198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竟然不到一年功夫,25萬言的《〈天問〉研究》便脫稿了。先生根據屈原的其他作品,根據歷史事實,根據考古發現的材料,對《天問》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研究,多發前人所未發。在聞一多先生之前,向來無人認爲《天問》有錯簡,聞先生只揭出“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一條,郭沫若先生只指出“伏匿穴處爰何云,寤過改更,我又何言”,但未及其他,而先生改正了今本《天問》順序的三分之一,凡三十餘句,把散落在夏、商、西周各代的錯簡整理出來,使問春秋七章自然歸成一組,各得其所,前後文義連貫,面目一新。先生對錯簡的整理,不僅有內證(屈原作品本身的證明),而且有考古學上的證明,即用徐州畫像石、吉林輯安通溝壁畫

墓、山東武梁祠畫像石的材料，為恢復問春秋七章提供了證據。對於古代的神話傳說，則採用民俗學的方法進行剖析，如指出“伯禹腹鯀”是父系氏族社會產翁制的遺俗，揭開了衆說紛紜的千秋疑案，為古代文學遺產的整理做出貢獻。先生撰《屈原傳》（未刊稿）之後，決意沿着屈子所走過的路訪古尋幽，考察山川風物，體驗屈子的章句，然終成未能如願之憾事。

《詩經》研究是先生獲取重大成果的又一個領域。從 50 年代開始，史學界討論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先生以《詩經》為基礎，旁證其他材料，從分析反映土地制度（公田與私田）和剝削形式的詩入手，說明西周從封建領主制進入地主制的嬗變歷程，考證周人在原始社會以熊為圖騰，從后稷起進入父系氏族社會，到公劉時代已進入階級社會，文王之世已進入封建社會；又用民俗學的方法解析《詩經》，發現 23 首戀歌的奧秘，指出它們都與上巳節（三月三）祭祀高禘、祓禊的民間風俗有關；還從《大雅·桑柔》篇的探索中，證明了厲王奔彘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農奴大起義所致。範文瀾先生讀到這篇文章後來信稱此論“為西周封建論添一支援軍”，又說“從《大雅·桑柔》篇找到證明，是一個新發現，我好久不在這個問題上用心，得讀大著，覺得新鮮可喜。陳陳相因，了無新證言論，實厭見厭聞也。”先生把研究《詩經》的 15 篇論文結集於《〈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一書，39 萬字，1966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此外，還發表了《〈詩經〉的史料價值》（1956 年）、《從讀史方面談談〈詩經〉的時代性地域性》（1957 年）、《說幽在西周時代為北方軍事重鎮（兼論軍監）》（1983 年）等論文。

70 年代，我國考古發掘出土許多漢代壁畫墓、畫像石墓，先生以研究中國古代神話和楚文化的雄厚功底，進而去探索它

們的內涵，認為漢代人的主要迷信是昇仙與打鬼。這一時期，發表的論文有《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畫幡考釋》（1973年）、《長沙出土的漢墓帛畫試釋》（1973年）、《馬王堆一號漢墓漆棺畫考釋》（1973年）、《洛陽西漢壁畫墓中的儼儀圖》（1977年）、《洛陽卜千秋墓壁畫考釋》（1977年）、《河南密縣打虎亭東漢畫像石墓雕像考釋》（1978年）、《中國古代器物紋飾中所見的動植物》（1980年）、《洛陽西漢壁畫墓考釋》（1987年）等。1973年5月要在日本東京舉辦“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南畫像石、碑帖拓片展覽”，先生為河南省博物館選展漢代畫像石50幅拓片，並一一寫出解說詞。先生將畫像石、壁畫墓中的神怪畫與古代的禮俗相融會，與神話傳說相貫通，見解獨到，發表相關文章約二十餘篇。

先生為人耿正，性格開朗，幽默風趣，一生簡樸，衣着無華，不飲酒吸煙，惟一的癖好是喜愛買書，雖生活困窘，仍節衣縮食，四處選購，留下許多書籍。凡先生讀過的書，書眉行間無不留下批語，圈圈點點，紅藍各色批語縱橫交錯，密密麻麻，甚至連原文也淹沒不清。先生在逝世前的日記中寫道：“我的心情並不愉快，有許多工作未作，有許多書未讀，有許多文章未寫，而轉瞬六十六歲，行將七十，為之奈何！”翌日又訂下“生活守約”七條，規定“每日至少看一篇文章，並作筆記”，“不浪費半天以上的時間”，並在“十年研究規劃”中說：“兩年內整理出夏史研究，寫出中國人從氏族到國家的歷史、中國國家出現史，為研究我國的階級社會史作出貢獻。”先生於1978年5月23日溘然辭世於河南開封市，終年66歲。生前僅留下專著兩本，論文八十餘篇及大量未發表、未整理的稿件，留下了無限的遺憾。

目 錄

序	(1)
殫精竭慮 求索楚風	
——孫作雲先生傳略	(1)
屈原的生平及作品編年	(1)
《天問》的寫作年代及地點	(12)
從《天問》中所見屈原的唯物論思想	(19)
《天問》對於上古史研究的貢獻	(27)
《天問》的表現形式	(42)
《天問》的錯簡	(55)
從《天問》中所見的春秋末年楚宗廟壁畫	(62)
評《天問》三家注	(71)
《天問》今本章次	(96)
《天問》校正本	(102)